

论沈从文的自然人性观

王文捷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沈从文在“知人而论世”的人学理念中吸纳现代科学人道主义思想,以原态“自然人”形象展示出人性的“生物”形式与“生命”神性双重积极意义;其人性模式渗透调合一致的灵肉观念与张扬的生命意志力量,以“爱与美”宗教性的博爱情怀和无私互助协作劳动的“桃花源”社会模式作为现代社会文明意义的重要考量;通过自然与文化的现代思辨来关怀现代人的人性活力与生命精神异化状况,使人性在文化的现代批判中洋溢着现实关怀与人本终极关怀完整的现代人文精神。

关键词:沈从文;自然人性观;现代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5-0092-07

相对于儒道思想“致中和”的古典传统人文形态而言,沈从文创作中人文观念的现代性一面意义同样深远。在中国作家一直思索传统人文精神并不断作出现代化诉求的大背景下,沈从文那蕴含着现代人博大“新情绪哲学系统”[1](76页)的丰富创作,它们或以梦幻笔调或从特殊视角展现湘西与都市强烈反差的人生形式,通过灵肉融合的“自然人性”人道地关怀现代的人生命运与精神取向,其中除了渗透作家对民族社会现代启蒙的现实关怀之外,更有人本存在与发展终极精神意义的人文性思考。

沈从文的文学理念中有一个“知人方足以论世”[2](145页)的写作信条。“先得学好好地懂人”的初步认识使他在“写人”时努力做到“透明地认识一切”。当时新文化异质的西方进化论、生物学、文

化人类学等现代自然与社会科学观念,连同20世纪民族现代化的时代思潮对其创作思想的广泛浸润,又进一步深化了他的“人学”文化观念及其现实认知,激活了他去“吸取一切人的气息”并“贴近人生”[3](41页),将人性与生命的文化精神世界作为其关注的焦点。他的目光由此直接面向他所熟悉的湘西民族,其笔触深入他们所拥有的“在人性的爱憎取舍方式上保留下的高尚的憧憬”,以此展示民族“人生”发展情景中存在的某种“庄严意义”[4](74页)。沈从文对民族性格和底蕴的这种开掘并不与同时代其他现代作家的创作思想趋同。他通过民族人类中一种原始意味的“乡下人”的把握理解,“从某种方式中”独特地完成“一些东西”,保留下民族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一些“虽变而不变”的内容,一些“在变异过程意义上”留下的“不变憧憬”[4](74页)。仔细审视这些展示历史与现实“常”与“变”的“内容”、“憧憬”的本质,我们便会发现沈从文的“乡下人”这一文化形象渗透了一种深厚的科学人本思

收稿日期:2004-01-12

作者简介:王文捷(1967—),男,四川营山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想,亦即一种融合现代自然与社会科学最新人文意义的进步人道观念。

人道观念的核心体现为对人生存发展中生命振奋与享受的肯定,即对人生价值尊严和个性意志自由发展的肯定。它最初虽然属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基于人类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等人性普遍性意义,逐渐成为了人类社会一种具有恒常性的历史价值观。如果说作家主体在文学创作中能超越人道主义的某些局限,在创作观念上将文艺作为对生命和人性全方位的审美观照,那么他必定能够对社会人生的普遍生存状况产生明晰的认识和同情,也能对人性通往完整意义的途径和进步光明的方向生发确切深入的理解。在这种目前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创作意义上,沈从文作品正是将自己的“心与力”贴近了现代“这个民族的爱憎与哀乐”,通过透视湘西人类“人性最真切的欲望”,表达出作家“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和“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他同时认为文学之所以“可尊”的原因便在于,文学的最高功能是“试在消除一切的界限和距离,消除一切不幸”,是“去理解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志和愿望”[5](109页)。如果说既往的中国文学艺术历史总是在“言志”和“载道”二重意义上延伸,而文学艺术应有一个不同于此的现代意义的新要求,那么沈从文认为,文学创作的最低效果应是作家“给自己与他人”以“把握得住的共通的人性”。这种“共通人性”还应同时达到“交流的满足”,由“满足”而产生心智的“愉快”和“启发”,进而使人们形成一种“向前进取的勇气和信心”[6](62页)。

这种人道意识贯穿在作家创作的主体思维之中,其因“满足”而“愉快”和“启发”的人性却是通过乡下“自然人”意义来表现的。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题材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乡下人”形象,这些“乡下人”从道德与人文观念看是一种原初的“自然人”,他们灵魂与意识深处呈现的都是一种“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这些“‘人’的若干新形式”为“人性”的意义作出了崭新的“一度诠释”[7](62页):他赋予这些乡下“自然人”生命“新形式”以非政治意义的独特内蕴,而将其意义基于“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之上。这种“向善”的内容却并不属于社会道德方面“做好人的理想”,而是读者从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通过此种人生景象的启

示达到“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8](114页)。

仔细分析这种“自然人”形式对“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和诠释,其“向善”核心意义已在于开始关注人作为动物“本能”的客观性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如果说现代人类关注的人性意义已由传统社会道德转移到了生物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科学领域,那么只有这些现代自然与社会科学才是我们拟定人类行为标准的根据,因而指向生命的生长和激进的生命本能应得到重视,且这种自我性本能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潜伏着人性爱的力量及创造力,它不应在生命过程与社会文化中受到阻碍和压抑。沈从文部分作品亦即从“食与性两种基本愿望”角度来“玩味人生,理解人生”[2](151页)。《用A字记下来的事》、《黑猫》、《旅店》等篇表现了生命与人性的潜意识观念,许多苗人小说如《雨后》、《阿黑小史》等颂扬自发性的“神圣的游戏”——性爱,表现一种不受羁绊的自然生理意义的“性满足”。而基于湘西传说的小说《月下小景》也从人类学的角度间接涉及了“初夜权”的性心理学说。他的一些现代城市人生活小说也常常表达性压抑导致的不健康心理。如《八骏图》对中年大学教授进行了含蓄的讽刺,指出他们心理失常及所受心理折磨大多来自其性的压抑。《湘西》中具体地以“性压抑”来解释“女子落洞”、“放蛊”等妇女的心理疾病,指明这些女性的人性本能的释放在外部世界受到了阻碍和压抑,在转向内部后便使她们生命形态表现出自虐、自谴与自我惩罚的倾向。他同时对湘西神巫信仰及将物神化的根由同样作出性意识的解释,并承认苗人的原始信仰于其心理压抑的缓释大有益处。

沈从文在吸收弗洛伊德生物本能等机能观念阐释社会人生的同时,还赞同一些合乎现代逻辑的人类学、伦理学、性心理学等现代文化学说,比如他遵循蔡元培阐发的有关文学艺术是原始艺术的延续的理论,认为原始艺术因娱乐功能而成为真正的人的艺术亦达到一种宗教目的,艺术活动是通过利比多的转移达到本能升华的重要途径,并使艺术家在自己创造的幻想境界中得到“生理满足”的快慰[9](14页)。这些美学意义与机能观念互相联系的原始艺术论,使沈从文同样对原始性的湘西人类文化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和关注。因而《湘西》中作家描写分析原始的宗教和精神疾病的同时,又像《鸭子》、

《过年》、《神巫之爱》等篇中那样突出地描述湘西人赖以依存的原始意味的风土人情,从人类文化学意义上阐释某种人类文明独特的社会人文模式和生命发展的关联。他对一些佛经故事加以改写,去掉它们的佛教色彩而融合进本民族的原始传说,并把其中人物变成“居住在山野的原态人”,意图通过呈现社会某种人类生活的原态文化模式,揭示形成民族心灵与精神本原的内在结构形态的源泉。

在此,沈从文的笔触沉潜于融合原态文化的社会文明中,其人性意义的考察开始趋向于对人类某种生命哲学意义进行探讨。就这种原态文明中机能主义与文化伦理相结合的人性内容而言,它的本质却与现代人类的“现代”文化哲学观念趋于一致。因为在这种人性意义中他首先强调了人应存在一个适当的动物本性,亦即“先要每一个人如一般的生物,尽种族义务”[10](350页),并认为人能贴近生活自然而“成为生物之一种”,“从‘万物之灵’回到‘脊椎动物’”,也是“上帝的一种巧妙安排”[11](290页),因而食的需求和性的满足这两种生物性需要都是正当的。他这种称为“生活”的认识其实体现着最为基本的人道意义。他进而认为,人还应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本性即“生命”,它产生的人类文化与文明是“弥补生存的空虚和厌倦的自由思索”[10](350页),其中包括对一切抽象的精神意义的自由追求。他认为人的高级的“生命”与低俗的动物的“生活”是相悖的,只有在人忘却物质利益的高层理想之上,“生命”才会带着“神性”亦即带着某种泛神的生命灵气。原始人一直带着疯狂的宗教意识(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寻求神力,这种“神力”存在于他们心灵和自身之外的多样的宇宙万物中,因而原始的泛神性部落的人类更接近生命的本体。艺术家作家通过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这种“原始自然人”相同的精神去寻求社会的真与美的“抽象”理想,可以帮助现代精神压抑者从中寻求一些有益的无私观念。如果人类被生存中固有欲望和物质环境麻木了“生命”的感觉,则可以通过这种自然的内在“生命”神性去关怀安抚他们的外在生活。作为原始“自然人”人性情感之美的艺术表现,并无害于社会文明的发展,又可缓和现代人本能的压抑。沈从文相信由生命“性本能”引起的原始创造力的神性,作家可以通过对这种创造力神性的“悟识”而“看虹摘星”。

二

沈从文曾言现代文学应成为“现代人的情绪发展史”[12](64页),其创作“美学形式”用“人的资格”去处理社会人们的“头脑”,希冀由此“运用到较高文化各方面”以放大他们的“生命同人格”[13](267页)。此种方法使沈从文架构出通向人性王国的“审美之维”,即以一种审美“乌托邦”把人性的爱欲指向社会文明,以生命的自然性升华取代压抑性的精神堕落,从而使人本结构中消极破坏性的本能彻底变为某种创造性力量,因此其“人性”论包涵着现代社会人文精神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思想要素。

那些“自然人”生命呈现出的最明晰形式是调合一致的灵肉观念。如果说人类基于社会道德的外在观念与自然本能的个人内心存在着矛盾,作为精神与肉体关系的灵肉调合是现代人文发展史里最根本的问题[14](4页),那么“圣明的神性”与“丑暗的兽性”必须得以和谐统一。在沈从文的边城世界里,自然的人性呈现为人生的一种本质,心灵与欲望达到融合一致的生命理想境界。这种境界强调了人正常的肉体欲求健康的满足和在此基础上人本心灵的自在。《柏子》里水手柏子们在辛劳飘荡中毫无顾忌地享受着生活,他们生存苦辛但其心灵是绝对的自然洒脱,教化的重负羁绊在他们生命中了无踪迹。《雨后》中质朴的四狗与姑娘的纯然而本真的“神圣的游戏”,亦充分地再现了满含真纯的灵魂的勃勃生机。同样,在《阿黑小史》、《夫妇》等作品里我们也能见到蕴藏在原始性山野里灵肉自然结合的生命灵魂,激发着现代人类对于灵肉一致之精魂的美好追寻。《来客》、《三三》等作品里出现的“纯清的河水”,则正是沈从文一种自然的充满健康活力的人性理想的象征。

在人类灵肉自然合一意义的基础上,沈从文认为人性更重要的是“从生物学自然律上”来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15](292页),生命意志在这个破旧立新不断更替的人性解放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他认为现代“种族延续国家存亡”的关键并非东方传统信仰的“命运”,而应在于由新的“理性”产生的“意志”,现代“生命的使用”主要在于能“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地“以‘意志’代替‘命运’”[15](292页)。他在《萧萧》里通过展示萧萧的自然

人性在礼教之下的遭遇,表达灵肉与个性自由追求在社会生活形态下的痛苦挣扎情形,表明缺乏生命理性“意志”的个体在传统伦理中的悲剧“命运”。《阿金》中也显示阿金婚姻幻灭原因也正在于其没有强烈的个性意志。而《丈夫》、《贵生》、《雪晴》等篇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本能,承认人的自我意志的作用并不断激发人们反抗蒙昧的夙命。民族群体的发展必然以个性的觉醒和解放为前提,追求人类“幸福的幻影”必须依靠解放生命本体自身。因而人类应努力采取疏离一切蒙昧的形式与状态,强烈主张生命自主的个人“意志”和冲破一切禁绊的反叛精神,通过打破一切限制达到自觉利用自我来再造自身。人类精神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精神意志的成长[16](54页),个体的觉醒和发展是民族激发反抗封建压迫精神力量的前提。因而沈从文在《三个女性》、《主妇》、《如蕤》等篇中,更为深入地展示了在现实和传统双重重压下,生命意志对现代青年个性精神解放的重要性。

如果说遵循进化之路人类还必须“更向上努力”,个体应努力由“现在的人”进化到“‘超人’之域”[14](101页),那么沈从文对个性意志的张扬还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扇陀》等有关民间故事与佛经传说塑造完美生命与智慧人物,通过抒写主人公个体的美、爱、神而成的“地上之神”形象,将“生活”中的人类提升为带有真正“神性”的生命个体,使人之下的“兽”和人之上的“神”统一于一体,人性发展最终达到类似于“超人”的完美境界。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对“超人”神性的张扬中隐藏着基督式的宗教态度。这种“宗教”态度基于一种纯粹的“美和爱的新宗教”意义,作家宗教徒式地在爱与美中张扬着个性意志的极度伟力。其后《水云》、“看虹摘星”系列作品叙述作家“情感发炎”生命历程中的多方思索,也是作家对生命意志之美的张力的深层次反映。这种泰戈尔式的“生命力量”的文化解析直接昭示生命个性与神性的要旨,在现代时空意识里达到的不仅仅是反封建的人间本位水平。

沈从文自然人性美与爱的“新宗教”渗透出普遍意义的博爱情怀。他坚信一个“象人的人”的思想情感,本来是“同社会哀乐爱憎原应当一致的”[17](21页)。如果说“人的文学”本身即是“人类的文学”[18](67页),那么文学虽然是个人的但更是

全人类的,文学的全人类性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因此沈从文着眼于湘西人民普遍的朴素情感,明白宣称以作品来诠释人类之“爱”并表达圣洁的“爱人”之心。《边城》、《三三》里不仅仅表达了浪漫的爱情,更表达了传统家庭与社会中普泛的博爱情怀,一种社会理想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至善关系。《连长》、《会明》、《灯》等作品用爱的情绪去改造他所感知的军队的生活。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并以宗教性非理智化的爱的信仰作为医治人们精神困境的药方。他从《圣经》里基督教的博爱中获取了“爱”的源泉,如《蒙恩的孩子》表达圣诞节时蒙恩孩子在孤儿院里的孤独情绪和对爱(母爱、父爱、友爱等)的渴求,并不很成熟的作品中却洋溢着浓烈而柔婉凄婉的各式爱意。沈从文认为好的作品能通过爱的美善打破人间关系的隔阂,让博爱的力量在人类现实社会中普遍展开而促进生命之“美”的建构。

个体生命意志与普遍主义“美与爱”相结合的社会人文原则,也会使社会进一步产生出和谐协作的社会文化生活模式。而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皆“出于劳动的认识”,通过“手脑的劳动”才有了“文化和文明”的一切事物[19](85页),无私互助与劳动协作本是文明社会的根基。由此说来,边城世界自然社会劳动模式仍然可以获得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意义。虽然这种模式呈现出本世纪初互助论和泛劳动式的空想意味,人们在这种远离尘嚣的湘西边城长河环境里安居乐业,在互相帮助与协作中和谐生活各取所需,其生活理想和行为准则包含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前进相统一的人道要求。如果说个人尽到“对人类的义务”同时也得到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协助”、“个性”和“发展”等构成的美方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20](201页),那么沈从文的充满人性的中国古典边城“桃花源”世界的现实意义仍然是较为深刻的。尽管它与当时流行的现代性“新村”思想产生了某种契合,但其中利他和利己相统一的人类社会关系是现代文明社会模式重要意义的考量。而人类本身就是这样“用双手一头脑创造出一个惊心动魄的文明世界”[20](86页)来的。《边城》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湘西人正是体现了一种“使别人过人的生活,自己才能实行人的生活,又因自己实行人的生活,才能使别人过人的生活”[20](204页)的准则,其中一种社会必要的自由式乡

村自我调节机制得以凸现。《长河》里作者“有意加入一点牧歌情调”的仁爱的乡村集会组织,更自觉地服务于在社会中受践踏的乡村民众,在保持地方文明生活中显示了极为重要的价值,人们相互间的责任感涤除了某种破坏意义的现代影响。沈从文的乡村乌托邦诚然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全面效仿的理想模式,但这种建构展示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转化为社会模式的可能性,至少从某种理论依据上提供了改善现实社会人类紧张焦灼关系的途径。

三

人性观念是现代人文发展过程中最为内在而又最为显明的概念。沈从文落笔于“人性”快乐能力的自由张扬及感情的自然表露,恰好契合了现代世界新文化观念的前瞻意义。如果说人性必须得以进步与完善这种价值观也是现代个性生命发展的基础,那么作家对湘西生命自然“人性”精神的表现也由此获得了现代性旨归。沈从文“借文字的力量”进一步把“野蛮人”亦即是“自然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希望民族的心灵和精神变得年轻与雄强起来,“好在 20 世纪的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21](456 页)。因而作家的“人性”意识对“生命”与“生活”双重意义的承认,乃至对生命“兽性”与“神性”相结合的追求,和当时流行的达尔文进化理论产生了共鸣,生存斗争的进化理论融入了其“人性”意义的内核。沈从文把对人的现代科学人道理解提升到整个国家民族人类现代命运的发展意义之上,并从此角度开始表达出对失去了活力的民族命运的担忧。

沈从文从而时常思索如何“解开自然与文化扭在一起的死结”,通过各种文学尝试进行“在两种文化中取样”,亦即在湘西自然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中进行各种有关人性的“文体实验”,以此逐渐成为“化合一个新的民族灵魂的精心实验”[22]。虽然沈从文早期都市文化的作品如《公寓中》仅仅描写城市生活竞争倾轧,表达没有同情与帮助的生存恐惧,但其后的作品却普遍地表达出现代文明的悖论和现代荒诞感,反映出现代社会物质的丰富发展反而使现代都市人生命败落这一特殊的人文现象。《八骏图》、《有学问的人》、《某夫妇》等现代都市生活小说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里充满着人化与反人化

(异化)的冲突。《绅士的太太》、《王榭子弟》、《顾问官》、《晨》、《大小阮》、《烟斗》等作品更是观照了现代文明中生命形式畸形而幽暗的社会现实,昭示出陷于自我分裂和生命价值困惑与窘境之中的现代生存形态。这种异化冲突引发的历史发展悖论使人类有时不仅偏离了人性的自由走向,甚至和人类最初的“自然人”的精神取向也是相悖的。作者通过这些小说提出人性的缺欠和人性的冲突,指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无形地捆绑住文明的人类自身,现代人类在拘束与压制下失去了生命常态而跌入了不文明的轮回圈中。

沈从文在这里是把人性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他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形式,痛惜现代文明进程中生命所受的戕害和某种倒退。如果说都市人精神的败落同原始人生命力的永不衰竭相比较,二者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的文化精神道德的堕落,那么沈从文的人文社会学探讨与中国传统道德批判又达成了一致的意义。他指出现代社会人文中的“都市病”、“知识病”、“文明病”等违反人性的病象,应当由人类那个“拘束人类行为,不许向高尚纯洁发展”的“名辞”负责,亦即应由“制止人类幻想,不许超越实际世界”的那个“有势力”的“虚伪的文化‘道德’负点责”[23](39 页)。自然人性中所寄托的高远理想蕴藏着对中国文化晦暗面最有力的挾伐。由此可见,沈从文描写“自然人”并不表明他把自然人当作人类的归宿,而只是欣赏崇尚其人生形式中的自在(由)与真率一面意义,如《传奇不奇》、《新与旧》、《黄昏》等作品便也对自然人的蒙昧与顽愚进行了批判。他对人性精神“抽象的明悟”是其用来反对和批判当下现代人类异化的精神机制,这种机制由边城“自然人”模式题材表现人性的真切欲望,并通过两种社会形态中“一切人的行为表现”来理解“人的种种长处和弱点”[24](54 页),于湘西生命的梦幻性赞美和现代贫弱人生的解剖性批判中,指示着人性的现代发展与进步的光明前景。

如果说西方人本论中个性意志和博爱精神尚存在利己与利他的矛盾,那么沈从文的人性观念却在他对于民族和社会、个体与社会的未来发展的关注中得到统一。《边城》、《长河》、《三三》、《雨后》等作品从别种文化角度展示“不同时间和空间生长的

生命”以及“生命不同的式样”，对他们与现代人类“发展不同趋向相同的目的”作出了“更有效的粘合与连接”[4]（74页）。这种粘合与连接以自然而自在的灵肉合一生命形式为基础，以独立的个性意志和深广的博爱观念为支柱，以个人和社会集体谐和统一的社会结构为架构方式，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人道主义文艺思想模式。这种“自然人性”模式以“生活”与“生命”意义贯通了“动物人生观”与“向抽象发展的欲望与意志”之间的联系，亦即人类物质和精神两者共同构成的人的两种最高本质性需要，一种连接人性“趋向相同目的”而走向自在自由的生命本质。从文化即人化的历史过程所表明规律来看，人的历史与现实活动目的应该同人类生命发展的终极目的得以同一，故而人性的自由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必然期待的结果，它渗透着在物质和精神双重需要上的当下关注与终极关怀两种价值维度。沈从文的“人性”是他努力将“人与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的思考和表达方式[25]（29页），是对人类尤其是现代人类生活及生命本身最为完整的人道关怀。

这种人道精神促进了20世纪一种文化意义秩序的建构，即通过（湘西）人类本体神韵的表述和张扬来具体阐释和明确构想现代社会理想的“抽象”观念。当时沈从文并不随时代主流作家去对社会现实世界作直接而浅近的描绘，激烈的现实阶级矛盾也没有阻碍他在情节生动、象征丰富且哲学启示深邃的小说中构筑自己的文化理念。如果说“自由的人性”是“人的全面自由”哲学观念中最有价值的题旨，那么沈从文体现艺术自主性的现代“主体自由”创作观念的底蕴，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现代作家的现代人文精神的深刻与崇高之处。因为人文精神本质其实并不仅仅在于“形而下”的对当下的人类尤其是普通平民和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也不仅仅在于“形而上”的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和生存价值意义的关注，当然也不仅仅是对某一时代思想萎缩与道

德沦丧的现实情势的救援思潮。它是社会道德价值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并非道德价值本身，其精神的形式和目标应该体现在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和关怀之上，必须与人对自身普遍永恒意义的关怀相适应。如果说现代人文精神应成为主体“为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解放而在心灵内部提前进行的自由的操演”[26]，那么它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作家作品应对人类自身的自由本质的自觉意识和追求，其本质属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并最终显示人本的终极价值。

沈从文在此意义上为丰富现代社会人文精神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描绘湘西社会“常”与“变”与都市人类当下的各种生存状态，关注着他们在现代社会里的生存变迁与命运，使“人化”的历史关注落到扎实的现实实践上；他营构出一个自然人性的理想梦境，在对自由人性精神渴求里折射出人类发展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试图防止当下道德律令对人的发展终极价值的偏离。可以看出，这种人文精神探寻在文化与文明深层次含义上达到了高度的自觉。他的创作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终极意义的深远烛照，召唤着我们民族曾经失落的人文意识的精华。这种独立的人文理性和人文批判昭示了现代人文精神乃至作家自我精神价值的深度魅力，并为民族拯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向度。当这种“个人——人类”统一的高远性人文探索在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实践中碰壁，而被其它诸如阶级性的政治理论思想覆没湮灭之后，沈从文不同于周作人等其他作家对人性文学观念的逐渐疏离，而以特有的执拗与热情来固守这一人本意义的“人的文学”观念，在其文化建构与价值恪守中生发出一种制衡现代社会生命异化的重要机制和反思角度。在诠释启发“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以及“人性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憧憬”的文学世界里[5]（109页），沈从文与鲁迅一样作出了真正的独立自由的现代精神追索。只有透过这种自由的现代人文精神的开阔视野，我们方能准确理解沈从文对人与社会独特的审美观照里所渗透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二十六[A].沈从文文集:第1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2]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 [3]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A].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4]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二十五[A].沈从文文集:第1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5] 沈从文. 给志在写作者[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6] 沈从文. 沉默[A].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7] 沈从文. 烛虚·五[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8] 沈从文. 短篇小说[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9] 蔡元培. 蔡元培民族学论著[M]. 中国民族学会编(台北),1962.
- [10] 沈从文. 给一个中学教员[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11] 沈从文. 长庚·二[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12] 沈从文. 新废邮存底·二十二[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13] 沈从文. 烛虚·二[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14] 厨川白村. 文艺思潮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 [15] 沈从文. 长庚·三[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16] 转引自. 秦弓. 觉醒与挣扎[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 [17] 沈从文. 新废邮存底·六[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18] 转引自. 金介甫.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
- [19] 沈从文. 绿魇[A].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20] 周作人. 艺术的生活·日本的新村[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1] 苏雪林. 沈从文论[A]. 苏雪林选集[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 [22] 易小明. 对抗中彻悟人生[J]. 吉首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1,2).
- [23] 沈从文. 八骏图[A]. 沈从文选集:第5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24] 沈从文. 新废邮存底·十八[A].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25] 转引自. 亨廷顿,等.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的再探讨[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 [26] 王尔勃. 人文精神的本质[J].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1).

On Shen Congwen's Natural Humanity View

WANG Wen-jie

(Humanities and Dissemination Institute, Guangdong Commercial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Chinese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 absorbs thoughts of modern scientific humanitarianism in his humanism idea of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enough to discuss the world", and expresses the double positive senses of humanity's "creature" form and its "life" spirit in the original form of "nature man". His humanity pattern permeates the harmonious conceptions of soul and flesh and much displayed willpower of life, and takes "love and beauty" — religious universal love as well as "Taohua Yuan" — a social model of selfless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as important measurements of the sense of modern social civilization. It is concerned with humanity vitality and the state of spiritual alienation through modern reflec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 and makes humanity full of completed modern humanism of reality concern and ultimate humanism concern through modern criticism of culture.

Key words: Shen Congwen; natural humanity view; modern humanism spirit

[责任编辑:唐 普]